



新闻丛书
XIN WEN CONG SHU

国际通讯选

刘思慕 著



重庆出版社

国 际 通 讯 选

刘 思 慕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重庆

封面设计 乔楠

国际通讯选

刘思慕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75 插页2 字数85千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00

书号: 7114·236

定价: 0.59元

出版说明

为了给新闻学的研究提供资料，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参考材料，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一套《新闻丛书》。

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半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丛书内容的一部分是现在写的当年回忆或追述，包括新闻战线各个方面的人或事，其间容或有不很切实之处，看法亦各自殊异；另一些资料则是几十年前在白区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现在看来，其中某些观点、论述或提法，难免有欠妥之处，但为保持其本来面目，我们均一律未予改动。

《新闻丛书》前言

《新闻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继《新闻研究资料》后的又一套有关新闻方面的书籍。它是《新闻研究资料》的姊妹读物。

《新闻研究资料》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历时三年。到今年年底，共出版了十六辑，330多万字。这是进行新闻研究工作和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一批党的、进步的报纸和新闻团体的史料；有一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史料；有一批革命前辈办报活动和办报经验的史料；有一批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具有影响的报纸的史料，等等。所有这些材料，都为《新闻丛书》的编选工作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依据这些材料，按照不同的选题，经过补充修订、增添内容，使它成为一本本内容充实丰富的专题著作。

此外，我们在编辑《新闻研究资料》的工作中，访问过许多新闻界的老年、中年和青年同志，其中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新闻界前辈，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回忆录；有积累了很多有价值资料的报刊史研究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编写专题史料；有对新闻采访、编辑、副刊编辑具有经验的记者、编辑，他们将为这套丛书写出有声有色的经验体会；有对新闻学作过深入探讨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专门著作。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这套《新闻丛书》的选题范围是十分广泛

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还将进一步广泛地约请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为这套丛书、为《新闻研究资料》丛刊撰写文章和著作。

我国的新闻历史悠久，新闻实践丰富，但新闻理论工作却显得薄弱。还没有引起新闻界本身应有的重视。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新闻史料的积累、新闻实践的总结和新闻理论的研究。总的说，是为了我国新闻学的繁荣和发展。

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为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提高和发展，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并在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我们欢迎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批评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八月

自序

解放前后，在广州、香港、印尼、衡阳、昆明、上海干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差不多半辈子都消磨在编辑部的斗室中。编编、写写、改改、看小样、签大样，熬夜班到天亮。壮年、中年的宝贵岁月，就是这样度过了。写的主要是国内、国际时事的短评、社论、编后话之类的急就章。当过编辑、主笔以至翻译（包括外国电讯的翻译），但没有正式当过外出采访记者。唯一的例外，是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举行期间，我以上海《新闻日报》特派记者的名义，到这个国际都市采访过会议新闻，并以《日内瓦会议散记》为题，连续写了一些通讯，在《世界知识》半月刊上发表。可是，“通讯”一类的东西，或类似“通讯”的散文还是写过一些，并发表出来。写的或是解放前旅居国外的见闻（如《闲话日本宗教》）和回国途中一些不寻常的亲身经历（如《出爪哇记》），或是解放后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期间的一鳞一爪（如《罗马尼亚见闻》等），此外，还有一些散文，虽然是在国内写的，但主要取材于外国报刊，其中也掺杂着自己的回忆和感受，体裁和风格还是近于海外通讯（如《战时日本百态》）。这些作品谈的既然是当时外国的人和事，新闻性比较强；在不同程度上又带点文艺的色彩，多少有点游记的味

道，但又不是游记，把它们归入海外通讯一类，倒比较恰当些。

我从三十年代起，就留心国际时事和从事国际评论的写作，多发表于《世界知识》和自己负责编辑的报刊上，也有一部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通通算起来，总在百万字以上。纵然在当时还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起点启发和教育的作用，但这类的国际评论，够不上学术性的水准，多是走笔写成，时间性强，过了一年半载，事过境迁，它们即使不流于“断烂朝报”，也变成“明日黄花”了。所以我从没有把它们搜集起来，出版一本国际评论选集的念头。

但对于上头提及的国外通讯一类的散文，我却另眼相看，并且现在把它们尽可能收集起来，应《新闻丛书》编辑部之约，凑成一个小集子出版了。对此，我如何解嘲呢？固然它们记录的、描绘的也是几年前以至几十年前的见闻和感受，已成为陈迹，但由于它们的取材和写法，内容和形式，与普通的新闻记事有所不同，现在我自己重新读起来，还觉得前尘往事，值得回首，值得吟味。给中青年的读者看看，也许象看旧时的记录片那样，因为他们自己从没有这样的经历和见闻，倒有新鲜之感。即便以解放后几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通讯来说，会议本身就是值得描写、谈论的历史事件。比如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与苏、朝、越、美、法、英等国为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而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从这次会议开始，而会议所在地又是有国际名城之称的日内瓦。我有幸以中国新闻记者身份躬逢其盛，把当时的耳闻目见，环境和气氛，录像似地用文字重现出来，使今天的读者看了恍如身履其境，相信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不是索然无味的。再如三年前写的《罗马尼亚见闻》，是以在东欧名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中心而写的通讯。这是一个有世界各国

近三十名代表参加、盛况空前的学术性大会。中国派代表团出席这样会议，是破题儿第一遭，万人瞩目。加之，会址又在我们的兄弟国家罗马尼亚的首都，我们受到东道国破格的款待，除不止一次地招宴之外，还招待我们在以名胜古迹著称的喀尔巴阡山区作三天的游览，使我们既饱尝了兄弟般友情的温暖，又开阔了眼界。这样的盛会，这样的旅游，是够丰富多采的了，从中选择一些更有意思的场面作为特写镜头，向读者重新“放映”出来也不是多此一举吧。至于《阿克拉速写》和《阿尔及利亚掠影》，也是在国外参加国际会议的副产品。1962年，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第一次非洲学家国际会议，也是我个人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的难忘经历。在会上，我听到恩克鲁玛总统的有说服力的讲话，从尼日利亚著名非洲史学家迪克教授等处获得教益。特别值得纪念的，我还有机会拜访了当时客居加纳的世界著名黑人领袖、学者、反帝战士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杜波依士博士和夫人，得到他们的殷勤接待并进行了一席亲切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会见后第二年老博士便逝世了）。可是关于出席这次会议和在杜波依士家中作客的情况，我已另有报道，在这篇《速写》中略而不谈，谈的只是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先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名胜和风土人情的片断。《阿尔及利亚掠影》是1965年在阿尔及尔出席作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前奏的专家会议时写的，我国的代表到得早些，离开会还有好几天时间，东道主便招待我们到外地作了四天的旅游，兜了一个圈子。虽然走马看花，浮光掠影，但我们借此对于这个刚解放三年的北非重要国家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城市和人民的一些特点，也增长了不少感性知识。我们从外地回到阿尔及尔没有几天，突然发生了布迈丁推翻了本·贝拉总统的军事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便流产了。我原拟写的有关会议通讯也写不成了，只剩下这篇“掠影”作为阿

尔及利亚之行的纪念。不错，从这些通讯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年左右了，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特别重视同第三世界加强团结，开展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看看这些前进中的国家怎样从昨天发展到今天，也是蛮有意思的。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还有《闲话日本宗教》一篇东京通讯和抗战两年后在香港写的近于通讯的五篇杂文《战时日本百态》。既然是“闲话”，总不免东拉西扯，夹七夹八；既然是“百态”，也免不了象百衲衣那样，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并且多少有点漫画化。因为“闲话皇帝”要坐牢^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我在这些杂文里对于法西斯军阀统治下的战时日本的怪现状暴露一番，冷嘲热讽一下，也不碍事。尽管事隔三十多年，但是军国主义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还没有完全绝迹，只要重读一下《无言凯旋以后——战时日本百态之四》开头闲话“靖国神社”临时大祭的一段文字，有政治敏感的读者，就不由得不联想到，最近日本一些内阁大臣以至首相堂而皇之去拜谒这个神社，激起舆论哗然，而仍然“我行我素”的新闻了。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重新发表这类的国际通讯和杂文，也多少有点“温故而知新”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把这些国际通讯一类的旧作，编在一起，重新印行，虽不敢说是完全没有“敝帚自珍”的味道，但还没有以老报人自居，没有以识途的老马自命，认为这些旧作可以看做青年新闻记者写作的“楷模”。后生可畏，后来居上。这个真理我是笃信的。何况，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闻事业有了不少的进步，驻外记者的通讯、特写，出国参观考察的各界人士写回来的国外见闻，就我所看到的，不少都是内容丰富、经过琢磨的高质量作品，有好些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不过，把自己的旧作重读一遍，再结合新近接触到的别人的作品，关于国外通讯或国外见闻的写作，我倒有如下的一些浅薄

的体会：

（一）写的应是真人真事真情景，言之有物，力戒向壁虚构，“客里空”。

（二）要考虑到政治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字里行间要贯串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红线。

（三）最好是下马看花，观察得深入些，细致些。

（四）不求大而全，可以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可以写侧面，写花絮。

（五）不要干巴巴，直溜溜，要写得活泼些，生动些，着点文艺色彩。也就是说，运用形象思维，有穿插，有装点。另一方面，又不宜过分雕琢，过分渲染。虽说“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抹得太浓就近于造作了。语言幽默、风趣是好的，但玩弄噱头则不可取。

我这些体会并不一定对头，并且自己的写作也没有做到，姑写出来也是想就正于同行和读者。

刘思慕

1983年4月15日于北京

注：1935年上海《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因该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中提及日本天皇，日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杜为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徒刑一年两个月。

目 录

自序·····	(1)
闲话日本宗教·····	(1)
国际间谍战·····	(8)
战时日本百态·····	(14)
一、由狗肉香肠说到“物动”·····	(14)
二、黄金梦的一瞬间·····	(17)
三、东京官场的横断面·····	(22)
四、“无言凯旋”以后·····	(26)
五、饥寒的冬天·····	(30)
出爪哇记·····	(35)
日内瓦会议散记·····	(50)
阿克拉速写·····	(73)
阿尔及利亚掠影·····	(79)
罗马尼亚见闻·····	(90)

闲话日本宗教

离开大谷光瑞师(日本佛教的头头)所抨击的“匪国”(见《光瑞纵横谈》指中国),到这个“现代”的国家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虽还没有机会钻到内地和社会的里面去,看个究竟,但至少从噤若寒蝉的报章杂志,乌鸦噪林似十钱一本的小册子所显示或暗示的一鳞一爪,以及零零碎碎的耳闻目击,知道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开倒车,并不见得比这“匪国”有逊色,甚至驾而上之。在物质生活上支配着日本的虽是三井、三菱等王国,在精神生活上支配着日本的却是封建甚至更原始的社会意识形态。详言之,在这方面,是单纯的忠君爱国的“日本主义”和低级宗教或不如说“邪教”平分的天下。这两者当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而是从畸形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母胎里所产的孪生儿。要知道这话怎样讲,让我们先从“邪教”说起吧。

读者或者说我夸大其词吧?假如我说,“邪教”的扩张力比三井、三菱的资金网还大一点。但是数字却告诉我们:1925年,日本的“类似宗教的团体”,也就是“邪教”团体只有九十八个,到了1930年,便增加到四百一十六个,现在已有八百多个。三井、三菱支配下的企业数能够以这样的速率增加吗?

而且，单就以“检举”或“扑灭”的“邪教”的内容来看，可令人吃惊的地方还多着呢。读者也许有人还会记得，去年冬天大本教出口王仁三郎的“大不敬”(对天皇)事件吧？这是近世日本邪教史第一桩惊天动地的事。现在被目为“邪教”的大本教，在当时却拥有四十万的信徒，出口王仁个人便挟有四、五百万的资金，而且在前年的秋天，这位怪物还要站在法西斯团体的前头，谋全国“爱国团体”的统一，与法西斯的生产党结成“昭和神圣会”，“以期基于皇道的本义的祭政一致的确立，神国日本的伟大使命的遂行……”它的盛大的结合式恰就在东京军人会馆举行。在这位怪汉的百万金钱的魔力吸引之下，全国的名士、军人如蚁赴膻，二条公爵担任了神圣会的总裁，出口自任总管，生产党的首领内田良平任副总管。在各军人团体的“明伦会”、“皇道会”、“青年日本同盟”，“神圣会”都与有联络，真是盛极一时。后来出口以“大不敬”和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检举，变作阶下囚，与“神圣会”有联系的法西斯团体和一部分军人倒没有被牵连，这也是可寻味的事。（见木下半治著《日本法西斯》第185—189页）

可是，大本教被“扑灭”没有多久，到了最近两个月，日本又发生两桩轰动全国的“邪教”案了。第一件就是曾任皇宫女官长，历任花嫁、鹤岭女学校校长，现任文部省所管教育团体、拥有七百万会员的大日本妇人联合会理事长兼大日本女子青年团理事，被尊为“日本女性社会教育之母”的故男爵夫人岛津治子女史及其他闺秀三名，在8月末因邪教不敬事件而被检举。这位有体面有声望，站在日本女性最高峰的贵妇人，所干的偏是女巫一样的怪事，在家里设立“法座”，以“神凭”（神灵附身）、“灵感”号召了不少的上流妇人做信徒，到了被拘留仍不改变她的狂信。这的确是对这个“现代”国家的大大的讽刺了，太有损于日本女性的面子了。所以，结果这几位名流妇人虽尝了好几天的囹圄风味，到头来还是靠着“感

应性精神病”、“偏质症”、“妄想性痴呆症”等医学名词，证明她们是精神变态者被释放。这种“龙头蛇尾”的结局，不能不说是饶有喜剧的意味啊！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9月底，“人之道”教团又以“桃色事件”而兴大狱了，到现在还没有了结。这个教团本是属于神道的“扶桑教”的一派，创立仅十一年，而教徒已号称百余万（实数也有60万），支部遍于全国以至台湾、朝鲜和“满洲”。据说，信徒有大部分是知识阶层，“华族”（贵族）、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军人也有不少。教内规模宏大，设有许多学校，发行刊物，它的大阪本部的大铜殿的建筑费，就花了八十五万元，可见该教生财有道。教祖御木德一的享乐，恐怕超过俗世王侯，至少经常有六名至八名的“侍女”来伺候他。该教的被“检举”，就是因为教祖对一个“侍女”的“贞操的蹂躏”的缘故。

总而言之，日本的“邪教”是极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之至，这几桩事只是比较突出的例子。近年来被揭发的有供奉灵狐（如“诚光教”）、借神诈财（如“天津教”、“神明教”）、怪术治病（如“大日本观音会”）等类的“邪教”案件，未被揭发的更不知多少。

不过，我这篇通讯绝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对大谷光瑞师对我国的诽谤反唇相稽，而实是想指出日本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加以检视。

应该对这种现象负责的首先是封建臭味还很浓的日本政府的神道设教政策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教育。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危险思想起见，明令军人和学生参加神道布教所。神道和佛教都受政府的奖励，宗教复兴之声高唱入云。日本的教育——尤其是中等以下的教育，后来就是养成驯服象羔羊似的国民为中心，同样标榜“日本主义”的“邪教”自然与受过这种教育的人相吸引。至于女子教育，由小学到大学，都是拿忠君爱国、贤

妻良母来做主要的“看板”(招牌)。受过这样麻醉教育的日本女性之有女巫式的岛津女史站在最高峰，也是当然的结果。

其次，近年来日本的大众生活的不安，实是“邪教”骤盛的主要原因。贫穷、失业、饥饿以及政府的高压和愚民政策，使大部分的民众彷徨无所适从，虽不致象在从前的“匪国”那样结成“大刀会”、“红枪会”的队伍，但至少也投入“大本教”、“人之道”教团的怀抱里了。出口王仁一面高揭“日本主义”之旗，自认为素盞鸣尊(日本的神祖)的化身；他方面却提出“土地国有”、“借债不用还”的口号，这显然是要投合那些在“土地饥荒”和“借金地狱”压迫下的日本农民大众的心怀，无怪乎他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人之道”教团的“积极性”却差一点了，但它也以入教可免除现世的种种不幸为号召。再次，日本人民大众因物质生活条件恶劣之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据最近调查，结核病死亡率之高占列强的首席；患精神病的每万人中有十二人；壮丁体格比前大差)，疾病丛生，而国家的医疗设备不普遍，私人医生取费极昂，多以灵术治病为号召的“邪教”在贫穷到无钱治病的劳苦大众中，自找到一个恰好的活动地盘了。这一点，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所以，最近日本“邪教”之盛行，并不见得是“时代错误”，而只是非常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

而且，象一切宗教那样，这些“邪教”既多把现世的不幸归于神意，以信神忏悔为解救之道，统治阶级正好利用它们来麻木人民大众的斗争意识。所以，好些大资本家、贵族参加进去，暗地里给予金钱和其他援助。更有一些野心政客想利用它们的丰富资金来做活动费(如“大本教”之例)，或借它们广大的教众来增加选举票(如“人之道”教团之例)，有这些人插身其间，它们的声势就更大了。

如果这种观察是对的话，那么，说“邪教”是日本畸形的资本

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日本主义”的同胞兄弟，不是太把它抬高了把！

表面别于“邪教”的是所谓“已成宗教”，计有神道十三派，佛教五十六派，基督教三十余派。前两者有寺院和布教所二十五万三千处，神道中的“天理教”，据称拥有七、八百万的信徒；佛教中的“日莲宗”有寺院三千七百所，僧侣九千人，信徒一百四十万人；“净土宗”也有不小的势力。这些“正教”在意识形态上与“邪教”差别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但它们对于“日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的内外进出的贡献却大得多，这些“已成宗教”之不列于“邪教”之林，有大部分是靠这一手。假如读者问我要证据的话，也可以揀一些举出来。

不消说，这些“已成宗教”都已彻底的“日本主义”化，连基督教也要把圣经的解释改头换面来适合“国情”（例如日本天主教新近便有这种改变）。它们祈祷祖国战胜，高呼“大日本皇国万岁！”但是它们还有更积极的任务。

第一，象基督教为欧美帝国主义前驱那样，“日莲宗”、“净土宗”、“天理教”等，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们的布教范围及于朝鲜、“满洲”、内蒙和太平洋群岛，“日莲宗”曾在“满洲”有广泛的政治活动，在非佛教徒间则有天理教徒供奔走。“满洲事变”后，它们的佛眼神眼又移到内蒙以至华北、福建来。在《光瑞纵横谈》里，不独称我们为“匪国”，而且主张“东西南北进”的大谷师本人便曾在内蒙的喇嘛间做工作。在华北方面，据说“天理教”对“支那人的教化”“收比较好的效果”。日本的佛教现在正打算在华北积极扩大它的影响（见1936年10月号《宗教公论》所载《在北支的日本宗教的现状》）。正如在黑色意大利卵翼下的梵蒂冈免不了帮着墨索里尼来骂骂苏联那样，“日莲宗”也演过这样的把戏。在“一·二八”事变勃发的前夜，恰巧上海有几个日莲僧人与中国